

# WENDE ZHIZI

【美】梁恒 朱迪思·夏比罗



——  
纪实文学

文  
華  
文  
學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文 革 之 子

〔美〕梁 恒 朱迪思·夏比罗 著

彭 萍 张晓舟 刘 欣 译

兰明春 贺 玲

责任编辑 黄原

封面设计 袁吉中

## 文 革 之 子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6号)

成都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62 1/32 印张：11 字数：22万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

ISBN T—5040—0151—3/I·150 定价：3.30元

## 内 容 简 介

《文革之子》在美国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各界强烈的反响，美国各大报刊争相对此书给予高度的评价。发行量居同一年度各类书籍的榜首。成为美国八十年代一大畅销书。

作者梁恒是大陆开放以来第一个特批的涉外婚者。由于移居国外，并和美国女士朱迪思·夏比罗结婚，受西方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在情节、场面的描写上较直率和大胆。朱迪思·夏比罗是本书的同著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亚洲研究硕士学位，她善于以中国为题材进行创作。

作者以独特的角度，大胆而真实地反映了文革中发生的一切；再现了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作者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和创伤，和对当时的社会和当权者的怨愤之气，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坦露了自己离奇的恋爱故事；描写了一些血淋淋的场面；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剖析有独到之处。它不仅帮助美国人理解了中国的过去，也使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他们认为无法理解并不敢相信的事实。此书情节真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令你不忍释卷。作者只在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希望广大读者能正确地分析和对待。

## 前 言

在世界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沉痛的全民性的政治磨难。

那么，中国人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作出的反应怎样？对那些新中国的第一代拥护者来说，党的政策的曲折发展与变化说明了什么？这对新一代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1976年，毛主席的遗孀和其他三人所结成的“四人帮”垮台了，他们之后的领导人通过各种宣传工具鼓励人们畅所欲言，诉说自己“文革”期间在那滥用权力的岁月里蒙受的不白之冤和在专断统治之下的不幸遭遇，诉说自己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所受的迫害。最近几年，他们为纠正“左”的路线作出了努力，以此扭转乾坤，医治国民创伤。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

在海外，至今还没有人对这场革命风暴中的个人生活作过详细的描述。即便有人能述说一二，也远远没有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更谈不上道出他们身历其境的特殊感受，只不过是旅游者一瞥而过的印象或学者的泛泛之谈罢了。梁恒叙述了他于1981年来美国之前在中国中部地区成长的过程，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了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并将革命不遗余力地进行到底，最终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着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影响深远的一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八年里，北京的领导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中也包括梁恒一家的热情追随。

1956至57年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一些知识分子借此机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起了党的重视和反应，其结果是于1957年至五八年间，开展了一场反对党内外“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梁恒的母亲成了无数斗争对象中的一个。继而之后的便是“大跃进”和对农村合作社进行合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的意图在于使中国尽快地赶上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然而事与愿违，运动使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梁恒对这些都作了清楚的说明。

六十年代初，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人的领导下，采取了一些相对温和的政策，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开始好转，可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毛的威信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左派势力也想重新取得他们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失去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等人的巨大成功便加剧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左派的鼓动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于1966年爆发。红卫兵拿起了“专政棍”，开始了夺权运动。刘邓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中国再度全面陷入混乱，近乎内战的地步。梁恒的红卫兵生涯将会告诉我们，在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夺得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的权力之后，迫害与被迫害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

196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参与下，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与此同时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6年，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的逝世使得一举逮捕以他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为可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集党政军最高领导权于一身，这种做法在党内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邓小平出面工作后，渐渐获得了支配权，并让年轻的同志取代了华国锋，华从此退出了引人注目的位置。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过去一直有争议的现代化问题又摆在了中心地位，也就是怎样使中国这个拥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走向现代化，他和其他领导人为中国现代化勾画了宏伟的蓝图，鼓励人民重新振作起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他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而这些知识分子却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历尽艰辛，倍受摧残，梁恒的父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这些领导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才能调动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青年一代的积极性，使他们对现代化的建设充满信心。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他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怎样满足六亿五千万三十岁以下男男女女的需求，他们年富力强，胸怀大志，他们要求接受更高的教育，需要满意的工作，需要象样的住房，他们要求不受保守势力和权威的压制，要求有一些言论自由。

梁恒，这位能说会道、性格率直、蓬勃向上的小伙子，在他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中，虽然有与众不同之处，和一位外国姑娘朱迪思·夏比罗结了婚，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自



已同代人很好的代表。朱迪思·夏比罗是他的妻子，也是本书的同著者，她不仅有高超的写作技艺，而且知道我们这些外国读者想要了解中国的哪些情况，因而她的工作更使本书锦上添花。梁恒并不是中国沿海大城市的产儿，而是在内地的一个省城长沙长大的，毛泽东曾在那里接受过高等教育。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梁恒在农村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为我们了解农民的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梁恒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也不是地主或富农家庭，否则在过去的运动中他们一家就足以成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对象。他的父亲是省报的一位编辑，母亲是地方政府公安局的一位干部，他们二人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都不是共产党员。

梁恒一家（父母、两个姐姐、祖母与外祖母和其他一些亲友）的经历，是千百万中国人的典型。诚如本书所展现的那样，读者通过它将会全面地了解到，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在为实现人民期待已久的现代化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是什么。

**杰罗姆·A·科恩**

# 目 录

## 前言

- 毛主席的好孩子…………… ( 1 )
- 困难时期…………… ( 18 )
- 我们的新母亲…………… ( 33 )
- “你是一个吸血鬼吗?”…………… ( 43 )
- 被捣毁的庙宇…………… ( 66 )
- 游街示众…………… ( 79 )
- 一次反革命事件…………… ( 89 )
- 到乡下避难…………… ( 96 )
- 新长征…………… ( 112 )
- 混入北京…………… ( 124 )
- 长沙的流血高潮…………… ( 142 )
- 家人四散…………… ( 153 )
- 流浪街头…………… ( 164 )
- 我们也成了农民…………… ( 183 )
- 毛泽东思想的春风…………… ( 203 )

更严峻的时局.....	( 220 )
审讯.....	( 236 )
篮球.....	( 244 )
吃社会主义.....	( 252 )
寻找彭明.....	( 268 )
女朋友.....	( 279 )
鸡蛋碰石头.....	( 299 )
美国女人.....	( 310 )
忧虑.....	( 333 )
译者的话.....	( 339 )



## 毛主席的好孩子

在我还不满四岁时，我曾从幼儿园逃出来过一次。要到每周星期六下午，家里人才来接我，那漫长的等待真令人受不了。每次家长来接各自的孩子时，我们小朋友便站在办公室门口，等着叫自己的名字。看着别的孩子一个个被接走了，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人遗忘了，于是，我会感到很悲凉，心中也充满了愤怒。终于，门口出现了我敬爱的外婆那虚弱的身影，她来接我回家。可是，这周我不想再这样悲凉地等下去。不久前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扇直通长沙大街的门。也许是严冬已过，那扇平日关得紧紧的，厨师们将它打开来透透气。于是，午睡时，等其他的小伙伴熟睡了，我偷偷从床上爬起来，从在椅子上打瞌睡的聂阿姨眼皮下溜了出去。我爬进那间黑魆魆的厨房，然后打开那扇门，奔向光明的自由世界。

我十分憎恨幼儿园。在那儿，你想吃糖时却不敢吃。在吃饭之前，阿姨们还要让我们把手背在身后，唱一支歌。如果你吃得过快，她们还要用打苍蝇的拍子在你脑袋上敲一下。那些歌曲和舞蹈——象“扫地”，“在工厂工作”，还有“在乡下栽树”——真是滑稽极了。扭“秧歌舞”时我又总想跳“忠字舞”，或者“军人舞”，拒绝扮演地主，狼和懒汉，因而受到刁难。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我总是遇上这些不顺心的事。那怕是不累，我们也得躺下。有时我无事可干，只得几小时几小时地盯着腿上一颗颗痣左看右看。

在那时只有那些干部的孩子才有资格享受早期教育。尽管我父母的级别都不高——我父亲是编辑兼记者，党报《湖南日报》的编委；我母亲是长沙市公安局里一位很有前途的干部。父母的这一切，就足以使我有资格接受早期教育了。我的父母都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洪流之中。为了他人的幸福，他们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满怀激情地盼望有一天他们会加入光荣、纯洁的中国共产党。很自然，他们便把家庭放在第二位。有时，父亲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几个月不回家。母亲只是在星期天才回家。她在单位里有间房子，每晚都要开会。我刚满三岁便被送到幼儿园去过集体生活，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只是我走了以后，外婆和奶奶都感到很是不习惯。我是最后走的一个孩子，她们非常非常地挂念我。

起初我和奶奶一起生活。她个子高，骨节大，是位很严厉的女人。她总是穿一身黑色的传统中国女装。她住在《湖南日报》社分给父亲的一套二的房子里，在干部楼的二楼。房子倒是宽，但她得和别人合用一个厨房，而且厕所还在楼外。她是一位吃素的虔诚的佛教徒。她严于律己，对他人也很严厉，唯独对她的孙子们仁慈和蔼。

母亲在长沙第一人民医院生下我，当时我体重十磅，这样重的初生婴儿，在这家医院里还是史无前例的。我奶奶先后雇用了十位奶妈，但她们的乳汁都不够我吃，最后才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奶妈。她是位十九岁的农村姑娘，住在离长沙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她自己的孩子刚刚死去。后来奶奶告诉我，她是唯一能喂饱我的奶妈，每次吸干她的乳汁以后，我就不会再发脾气了。在其他人面前，我奶妈总是为我不凡的

身高而自豪——我有61公分。后来，她走了，因为没有长沙市的户口。不得已，奶奶把我送到外婆那儿去。外婆就住在附近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

外婆家很拥挤，外婆、舅舅、舅妈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都住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子里。可我很喜欢那儿，因为那儿充满了生机，还因为，我是外婆的宠儿。她给我糖吃，无论到哪儿她都带着我，即使去自由市场买菜，她也带着我。外婆身材矮小，她的门牙很大、有点往外咧，双手满是皱纹。她的话很多，但显得很有神。她和奶奶有很多不同之处。她年轻时便死了丈夫，当时她刚生了第三个孩子；而奶奶却不同，她生了九个孩子以后，她丈夫在旧城门的冰路上摔了一跤，死了。在旧社会，“好女不嫁二夫”，二婚女人不可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于是，外婆便靠在家做鞋后跟扶养起两个没爹的孩子。后来母亲和舅舅都长大成人，并有了工作，但是她仍然做鞋后跟。她用的那些布条也成了我的玩具。

我喜欢同外婆住的另一个原因是，母亲在星期天经常喜欢回外婆家，而不是我们自己那个家。因为奶奶与我们同住，她和奶奶的关系不好。奶奶有时管别人的事管得太多，以至她自己成了一个忙人。她总是第一个去扫楼梯的人，还愿意领导邻居们做大扫除，她总是不断地责骂母亲，不是说没给我们穿够，就是说没有给我们买回足够的牛奶。她高高在上，母亲是很难伺候她的。而且，传统也要求母亲服从她。尽管母亲是一个好争吵的人，她也只能默默地看着奶奶用糖果娇惯我们。而且，后来还替我第二个姐姐做家庭作业。父亲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他和母亲一样，也受孝顺的约束，

不能抗议。

总之，母亲和她这个新家不可能建立很强的纽带。在结婚之前，她几乎不了解父亲，他们是经人介绍相识的。他们相互通了几封信后（那时我父亲在桂林工作），由于共同的政治热情，他们很快就结了婚。父亲的文化程度比母亲高得多，因为党派他去受教育，并成了一名记者。他的文学爱好广泛，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还是一位业余作曲家和指挥。当然，母亲的能力也很强。她是一位喜欢表达自己意见的坚强女人，她空下来时，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以后，当我追忆往事时，我才发现我的父母难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也几乎是一种形式。

于是外婆家成了我孩童时感情依恋的中心。我一逃出来，便直奔外婆家。我必须横穿一条大街，很幸运的是，我没有碰上任何麻烦。然后，我便向几百码之外的小胡同里那间熟悉的房子走去。

令我不解的是，外婆见着我并不高兴。“小胖，你来干嘛？”她立即抓起我的手，把我拉到几个街区外的奶奶家。在《湖南日报》社宿舍的大院里，两位老太太连抱带拉地把我送回了幼儿园，一点也不理会我的叫喊声和眼泪。

阿姨们已发现我不在了。她们同平时一样，毫无教养地，在我奶奶和外婆面前，没完没了地数落起我来。奶奶和外婆走后，她们把我和另外两个调皮鬼关在一间屋子里，还说：“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你们没有遵守革命的纪律。你们呆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另外两名小犯人的遭遇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是因为偷了几颗糖被关了起来；另一位是因为刚换下叉叉裤，很快又



把新裤子糊上了泥土而被罚的。对小孩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席地而坐，各自玩各自的，这是一件十分方便的事。可我们却认为穿叉叉裤是一种不成熟的象征。他还有一件不舒服的事，刚才被奶奶打的屁股，现在还疼痛不已。我用同情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不幸的人。至少，他将为此再穿上一年年的叉叉裤，而且随时都有被打屁股的可能。

由于我从小便被灌输了毛主席象太阳的思想，阿姨们的话还给我带来了另一种痛苦。在家里，‘毛’字是我学会叫“妈妈”，“爸爸”、“奶奶”后的第一个字。在我家门口，父亲将一张巨大的毛主席画像镶嵌在一个像框里，家里人经常把我举起来，对着毛主席画像，教我说“毛”字；稍大一点，我便学会了说“我爱毛主席”，还有“毛主席万岁”。这些话直到我上幼儿园才理会到它们的含意。他象一位慈善的神，由于有了他，我们才能玩耍，才能休息。因为他爱我们，才给了我们苹果，葡萄和其它的一切。第二天，当阿姨们告诉我毛主席已原谅了我时，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

在幼儿园的第二年，我学会了写自己的姓。我的姓包括了毛主席的姓的几个笔划。后来，我又学会了写自己的名，我发现自己的学名和外婆叫我时引以为荣的“小胖”大相径庭。我的名字出自一个政治故事。

1954年5月2日清晨，越南人在奠边府与法国的一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在那天下午，在远处传来的鼓声和铙钹声中，我母亲生下了我，一个十磅重的男婴。我父亲正在给《湖南日报》报导越南的胜利。他认为给我取名叫梁奠捷——奠边府传来的捷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